

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形象在中国的变化

李随安^①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哈尔滨 150018)

摘要:从 1949 年到现在,俄罗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友好——对抗——正常化”这样一个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俄罗斯(苏联)在中国的形象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变化:天使,魔鬼,友好邻国。在前两个阶段,不论两国关系是友好、还是敌对,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歪曲的,不同的只是 50 年代苏联的形象被美化,60 年代、70 年代苏联的形象被丑化。到了第 3 个阶段,俄罗斯的形象变得比较真实、客观。相互营造客观、正面的国家形象对中俄两国极为重要,需要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形象;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她与伟大的北方邻国的关系经历了“友好——对抗——正常化”这样一个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这个北方邻国在中国的形象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变化:天使,魔鬼,友好邻国。

一 天使形象(蜜月时期, 1949 年—1960 年代初)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上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对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持敌视态度,对它施以经济封锁,中美两国甚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面对如此恶劣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要想冲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和打压,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尽快地建设和发展自己,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亲苏政策,亦即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理性选择。

就苏联来说,它当时处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战之中。苏联本来就没有欧美发达,且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所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是力不从心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它也迫切需要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两个大国暂时把双方的分歧搁置在一边,建立了同盟,进行了大力合作,两国关系出现空前的友好局面。是为中苏两国的“蜜月”时期。

中国进行了长达 10 年左右的全国性的亲苏宣传、亲苏教育。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专事推动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其支部遍布全国,其活动中国的党政要人都参与。中国希望加强两国关系,维护一个美好的周边环境;以苏联的美好、幸福、先进、繁荣鼓舞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士气,激发他们对建设美好社会的希望。

新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而苏联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有着 30 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进行了巨大的援助,帮助新中国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中国人民非常感激苏联的援助,对苏联的繁荣和发达极为敬佩和羡慕,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光辉榜样。所以,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全方位地学习苏联,模仿苏联。当时的中国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

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处于友好气氛的热浪之中。中国党、政、军、共青团、文化界的代表团频繁地访问苏联,中国媒体热烈地宣传苏联的伟大成就(如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各界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友好活动,中国向苏联派遣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中国的工厂、企业、高校聘请了众多的苏联专家,中国出现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热潮,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形成澎湃之势。^[2]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的形象是非常美好的。

① 收稿日期:2008-06-19

作者简介:李随安,男,安徽泾县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俄文化关系。

中国人民对苏联怀着炽热的情感,亲切地称呼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文化背景里,“老大哥”这个形象包含了资历老、能力强、宽厚、善意、友好、乐于助人、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等内涵。

在狂热之中,中国对苏联进行了美化和粉饰,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形象固然美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曲的、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塑造美好的苏联形象当然符合苏联的利益:有利于苏联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巩固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龙头老大的地位,增强其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苏联那时有意配合中国,亲自参与对自身形象的塑造,亦即尽可能地展示美好的一面,掩饰自己的不足。中国人访问、观摩的工厂、企业、集体农庄、学校、家庭,几乎都是苏方事先安排好的。为了迎接中国人的访问,苏方甚至事先做过“彩排”。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只能看到极其有限的方面,得到的信息很不全面,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的是被美化、修饰的场景,与真实的苏联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

塑造和维护美好的苏联形象是当时中国的政治需要。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骇人听闻的事实,曾经光芒四射的神一般的斯大林现出真实的面目,苏联社会的黑暗暴露在世人们面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都为之震动。然而,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非常消极,对中国百姓隐瞒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的负面信息,以至于苏联社会的美好形象及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得以在中国继续保持。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一是显示中国党、中国政府的独立性;二是显示自己维护马列主义的坚定性,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是担心这些信息动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引发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怀疑,进而造成思想混乱,动摇国本。

在20世纪50年代浓郁的亲苏气氛中,中国人只能高谈友谊,歌颂苏联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支援,苏联的负面是不能提及的,否则会招致麻烦,甚至不幸。例如,曾有知识分子,因为说“海参崴是我们的,被沙皇俄国占去了”,因而被打成“反苏分子”;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因为反对照搬苏联的教育制度,而被打成右派。

在20世纪50年代热烈的友好气氛中,也潜伏着危机,只是暂时还没有公开化。

1955年9月,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蜜月”之

中,赫鲁晓夫却对来自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疑惧,他甚至请求对方帮助他对付新中国。阿登纳这样回忆道:“俄国先生们很坦率地谈起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说:‘你看,我们俄国有下列任务:首先,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我们必须象美国一样扩充军备;第三,赤色中国将会怎样发展?’赫鲁晓夫作为俄国的首席代表曾在1954年秋到北京参加会谈,结果是俄国不得不对赤色中国作出明显的让步。在他的谈话中明白地流露出对赤色中国的忧虑。”后来,赫鲁晓夫对阿登纳再次谈到中国时,“他把赤色中国说成是最大的问题。他说:‘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6亿以上人口,每年还要增加1.2千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这时他双手拍在一起,‘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您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人吧!’……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提过三次。”“在这次谈话中,赫鲁晓夫心直口快。他对我说,俄国在世界上面对着两个敌手:美国与赤色中国。在谈话中,他请求我帮助俄国对付这两个敌人。在这两个敌人当中,他特别强调了赤色中国。对赤色中国的这种恐惧,今天虽然还不怎么厉害,今后的10年也不会很厉害,但也许在今后的20年。赫鲁晓夫看得很远,并且考虑着各种各样的事情。”^[3]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在骨子里根本不能容忍将中国当作苏联的小弟弟,他对赫鲁晓夫非常轻视,对美化苏联、全面学习苏联更是厌恶。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甚至嘲讽地说:“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4]

可见,1950年代苏联的形象固然美好,但却是相当脆弱的。在1960年代初,这个美丽的肥皂泡终于破碎了。

二 魔鬼形象(对抗时期,1960年代初—1980年代中期)

中苏两国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国际事务方面,特别是在对待美国的政策上,两个盟国也有深刻的分歧。总之,历史遗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家利益的冲突使两国的同盟关系难以持久。1960年代初,两国的“蜜月”走到了尽头,

两国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而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9年春天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两国的对抗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

苏联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很大发展,国家实力得到提升。随着国力的强大,苏联开始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曾一度处于进逼美国的态势。苏联一面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地采取攻势,一面加强对华约集团各国的控制。“经互会”是苏联主导的超国家机构,苏联利用它推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以这样的方式侵犯和剥夺华约集团内其它国家的主权。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理论,为干涉和控制兄弟国家制造理论依据。一旦某个国家不那么顺从,就会遭到苏联的无情打压,1968年8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苏联的劣行在侵略阿富汗时期达到高峰。苏联由此在中国和整个世界面前打造了自己的不良形象。

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使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天使变成了魔鬼,“老大哥”变成了死对头。

在对抗初期,苏联被中国冠以“修正主义”;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认为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苏联得到了新的称号——“社会帝国主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认为苏联成了“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5]1979年12月,苏联侵略阿富汗,似乎证明了中国打造的苏联形象的正确性。

中国在对抗时期塑造苏联形象的重要策略是: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所谓“苏联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截然分开。中国的观点可以这样加以概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斯大林逝世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窃取了国家领导权,苏联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步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演变成到处侵略扩张、威胁世界和平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8个字表述苏联变修给予中国的沉痛教训。^[6]

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反映到苏联形象的塑造上,苏联的修正主义形象被毛泽东借用来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当时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警惕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反修防修。可以这样描述赫

鲁晓夫其人带给毛泽东的深层担忧: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热烈地歌颂斯大林,骗取了他的信任;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对斯大林无情地攻击和诋毁,并引导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毛泽东以苏联为鉴,对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深刻的怀疑。他深怕苏联的一幕在中国重演,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无情地铲除潜在的敌手。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号角是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修改了7次,其中有这样一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刘少奇被诬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惨遭折磨,从肉体上被消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忌,对修正主义的恐惧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因。

不能不指出:在中苏交恶时期,中国的宣传机器对苏联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丑化。有时候,丑化苏联形象的方式是很拙劣的。例如,中国的媒体宣称:在苏联叛徒集团统治下,苏联人民生活困难,粮食不够,只能吃黑面包。实际上,黑面包是苏联的优质面包,很不容易弄到。这个错误被苏联用来塑造中国形象:刊登于苏联报纸上,以此说明中国人的无知可笑。还有一个关于苏联的离奇说法:“在苏联,很多十八、九岁的姑娘都是跛子,拄着棍子去上课,这是穿高跟鞋摔坏的,因为苏联气候严寒,常年积雪,滑得很,也可以说被修正主义道路摔坏了”。^[7]

苏联当时也对中国的形象进行了丑化。^[8]

应该指出:即使是在两国关系最为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对列宁、斯大林仍然保持着极大的敬意,这两位苏联领袖的肖像在中国的广场、会议室、教室里悬挂着,他们的著作被中国人作为经典加以阅读和研究,他们的革命活动、动人故事和伟大业绩在中国得到广泛宣传,例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列宁在流放地吃“墨水瓶”的故事。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在中国广为传播,反映斯大林革命生涯的文章《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被选入中

国的中学教科书。另外,苏联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们的作品(《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中国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经典,受到肯定和赞颂,以各种版本(包括连环画)广泛发行。那时的中国中学生都熟悉甚至可以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有名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神化列宁、斯大林、赞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动机显然是:显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继承者。当时,中国大众所能接触到的苏联文化元素基本上只限于这4个苏联人物及其著作。也就是说:在中苏关系的冰河时期,这4个人物及其著作成为在中国人心中支撑美好苏联形象的主要因素。

与1950年代一样,这个时期的苏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歪曲的、不符合实际的,不同的是50年代是美化苏联,这个时期是丑化苏联。国家关系的恶化导致中苏两国相互妖魔化,相互妖魔化又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长期反华宣传在苏联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中国怪影”,20世纪90年代喧嚣于俄罗斯媒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中国怪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

三 友好邻国(1980年代中期—现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停止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淡化,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了变革。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个存在了70多年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形成松散的“独联体”。以后,各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解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到北京访问,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两国关系因此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关系逐步发展,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了21世纪,这一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2006年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2007年俄罗斯举办了“中国年”。之后,两国又准备举办

“汉语年”、“俄语年”。这一切标志着两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20来年也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显著。通信方式的变革、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地球村更加小了,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打开了国门,大批国人以各种方式、各种身份(外交、经商、留学、开会、旅游)走向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人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客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形象越来越接近真实,形象也比较正面。

这个时期,中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困境中挣扎了10多年。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终于走出低谷。普京总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总统。俄罗斯将恢复昔日的辉煌,成为一个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国家。第二,俄罗斯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俄罗斯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做得远比中国成功。第三,俄罗斯具有伟大丰富的文化。对此,中国的文化人尤其印象深刻。这些年里,有很多中国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学者到俄罗斯访问,进行文化交流,他们对俄罗斯同行的艺术天才、学术水平给予高度评价,俄罗斯的文艺演出、精美建筑、博物馆里的丰富藏品让他们赞不绝口。第四,俄罗斯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文明程度普遍高于中国国民。在电影院、剧院、商店、车站、饭店等公共场合,俄罗斯人着装整齐,举止文明——自觉排队、不喧哗、不随地吐痰。很多中国人做不到这些。第五,俄罗斯是一个不完善、不安全的国家,缺乏必要的法规和秩序,在很多方面还很混乱。中国人在俄罗斯总是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警察带着敌意检查护照,税务人员勒索,海关人员刁难,甚至还遭到种族主义分子、“光头党”施加的肉体伤害。中国人不喜欢的、或者说讨厌的俄罗斯人是公职人员。中国人认为:不少俄罗斯公职人员(例如警察、官员、海关人员)贪婪、卑鄙。^[9]

四 结论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形象在中国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前两个阶段,不管是关系友好,还是剑拔弩张,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歪曲的,不同的只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美化,60~7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丑化。到了第3个阶段,俄罗

斯形象变得比较真实、客观。

2 在前两个阶段, 苏联形象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塑造的, 中国大众只是接受者, 也就是说, 中国大众很少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获得苏联的真实信息, 形成关于苏联的正确形象, 几乎是全盘接受政府的“产品”。到了第 3 个阶段, 中国大众开始参与俄罗斯形象的构建, 他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俄罗斯形象传播给自己的同胞, 使俄罗斯在中国的形象变得饱满、全面起来。

3 20 多年来, 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化, 而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 具有既不同于原先的苏联也不同于中国的体制。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方向把握得比较强, 俄罗斯政府对媒体的掌控却松弛得多, 这就造成了两国行为的不对等: 中国媒体以正面、客观、友好的态度介绍和评论俄罗斯, 报道和宣传的口径整齐划一, 从而在中国营造出了比较好和正面的俄罗斯形象; 而俄罗斯媒体的言论五花八门, 在一定的時候、在一定的程度上妖魔化中国, 例如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进行领土扩张”、“中国进行人口扩张”等等, 在其国民中煽起对中国的的不信任和恶感, 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两国不对等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 近十多年里, 俄罗斯在中国的形象要好于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10]

4 良好的国家关系可以促进客观、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塑造, 正面的国家形象又可以反过来增进两国的关系, 这是良性互动; 而在两国交恶时期, 国家关系与国家形象形成恶性互动。

5 相互营造客观、正面的国家形象对中俄两国极为重要, 需要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两国应充分认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尽可能向自己的国民提供关于另一方的客观、公正、全面的信息, 禁止歪曲的、片面的、敌意的报道。

6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

国、苏联这样的国家, 政府始终是自身形象、他国形象的塑造者, 政府掌控着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书籍等, 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广大百姓只是受众而已。

7 塑造国家形象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这样: (1) 全民参与; (2) 尽可能通过亲眼、亲耳、亲历获取第一手信息; (3) 依据全方位的真实的信息进行公正的判断。具备了这 3 个要素, 方可形成关于某个国家的真实形象。但是, 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来说, 这还只是一个理想。

参考文献:

- [1] 李巧宁.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1949-1960)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2] Ли Суй - ань.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 -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50-е годы) [J].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7(3).
- [3] 戴高乐. 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 [M]. 中译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66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298
- [5] 人民日报.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6] 龚良佐. 苏联是怎样蜕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7] 河南省工代会政工组. 在新沙皇的黑暗统治下 [J]. 学习资料 (打倒新沙皇), 1969(40).
- [8] 亚·弗·卢金. 俄国熊看中国龙 (17-20 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 [M]. 刘卓星, 等,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213
- [9] Ли Суй - ань. Россия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йцев [J]. ДВ учёный, 2006(12).
- [10] 李随安. 中国与俄罗斯: 国家形象之比较 [J]. 西伯利亚研究, 2007(4).

(责任编辑: 骆晓会)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America is still a Christian country even if it is influenced by Protestantism. Protestant value conceived America's distinctive rational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while the common ethics shared by Christianity safeguards the social order of America. The ethic of honesty and fidelity founded the operation of law. The idea of obedience restrains social rebellion. The moral principle of universal love is the adhes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buffer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America; democratic system; Christian ethics

(8) Thought on Enacting Illegal Exchange Purchase to Restrain Foreign Speculative Fund

ZHANG Jia-hua¹, ZHOU Xiong-wen² (037)

1 Meizhou Branch, People's Bank of China, Meizhou Guangdong 514021, China; 2 Law Faculty, Hunan University of Industr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upvaluation of RMB strongly expected, large foreign speculative fund has poured into China, severely affecting the state'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urit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riminal Law attacking the crimes of cheating exchange, arbitrage, illegal buying and selling during Asia financial crisis should be learnt and Illegal Exchange Purchase should be enacted to restrain foreign speculative fund.

Key words foreign speculative fund; Illegal Exchange Purchase; crime structure

(9) Russia's Changing Images in China Since 1949

LI Su-ran (049)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g Heilongjiang 150018, China

Abstract Since 1949 Sino-Russian (Soviet Union)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friendship, confrontation and normalization, its image in China changing from angel, demon to friendly neighbour. During the 1950s Russia was prettified in China whil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t was vilified. Not until during the third stage, Russia's image in China became real and objective. To build an objective and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ussia and China as well, which needs joint efforts of both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 Russia's image; Soviet Union

(10) The Labour Movement on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LIU Fu-chun, HE Bin, WANG Ke-zhen (057)

Jinggangshan Cadres Academy, Jinggangshan Jiangxi 343600, China

Abstract The labour movement on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marked another experimental step forwar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in their search for truth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orkers had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be voted. Their jobs were secure. The trade unions were entrusted with great power. Despite its poor organization and ineffective leadership, the labour movement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wid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d Power, and provides rich experience for future labour movements.